

阡陌岁月

出校门即是西操场,穿过紧贴着县少体校篮球场北侧围墙的那条黄土小道,沿着上水洞路东去,经过县前街,斜穿北门街,从朝西的后门进入大会堂院子。

这是当年从温岭中学去温岭大会堂看电影,我无数次走过的线路。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上水洞路,沿着一条窄窄的溪流顺流而下,每天都有附近居民蹲在溪边洗洗涮涮。沿溪民居的烟囱从老旧的青砖墙里探出来,时有袅袅炊烟吐出。经过县前街口,左侧拐角是我们经常要去买米的粮站,我拿一个小布袋,带上粮票每次去买十斤米。肚子里油水少,米吃得快啊,每过个把星期就要去那儿一趟。米柜立面上有一排半圆形拉手,师傅攥住那个“10斤”的闸门拉手用力一拉一推,经过计量的米就顺着四十五度角的铁皮滑道倾泻而下,我已早早地将米袋布控在从柜里伸出来的滑道底端,将一堆属于我的大米一粒不剩地纳入袋中。

记得学校一般是两三个星期会有一次大会堂的包场,如果按这个频次计算,一个月两场,三年下来有五六十场之多,加上假期、周末看的,估摸着三年看了近百部电影。在学习紧张、信息闭塞、文化生活贫乏的年代,电影给平常的日子增添了色彩,其呈现的故事、宣扬的意识、艺术的成分,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并塑造着年轻人看世界、看人生的视角、态度和品位。

赵班长分发电影票公平公正,众目睽睽下,他把整版的票撕开,将印有座位号次的正面朝下,盖着时间印戳的背面朝上,像洗牌一样打乱,然后顺位发下来。领到的票有晚上第一场,也有第二场,位置有好也有差,大家有中彩票般开心的,有失望叹息的,还有协商着寻思互换的,教室里好一阵热闹。

至于当年具体看过哪些影片,从片名到内容,大多已无记忆。但是,还是有一些影片和情景印象深刻。

刘晓庆主演的《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这一历史题材的恢宏巨制,应该是人学第一学期看的。记得此前一天,我们带着方凳在教师宿舍楼前的小操场集会,坐在一排单杠前,阵风卷起地上的泥土在空中飞舞,教历史的金老师就着偶尔会发出刺耳喇叭的高音喇叭开讲,从还原历史角度,为我们讲解这两部影片的历史背景,引导我们了解中国近代史,更好地去欣赏影片。金老师是一位有才又幽默的老师,高个眼镜,朴实衣着,说一口自带腔调的普通话,应该不是温岭当地人,偶尔会学几句并不地道的朝上话,听起来有趣而滑稽。讲到马克思生日,他曾在课堂上说,马克思诞生,《资本论》出版,给了资本家“一刮一刮”两个巴掌,打得“嗯嗯”直

叫。“1818年5月5日,马克思诞生日”,无需刻意,终生铭记。

《高山下的花环》是对越自卫反击战题材,那场仗打得惨烈啊。第二天语文课堂上,黄老师发问,大概意思是,影片最后一幕,一群战士赤裸着上身,躬身在一个池塘里洗澡,银幕上露出了小伙子们结实的身躯,问我们这个特写镜头有何寓意?我是一头雾水,会有啥寓意呢,战场上摸爬滚打流血流汗的,见到水塘大家忍不住跳下去一洗为快呗。经过一番试错、猜测和老师的循循善诱,后来有人答道,“通过展现战士们的后背脊梁,来表现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我一听当时愣住了,从战士的背影联想到民族脊梁,太了不起了,竟然有这么厉害的同学。黄老师对这位同学大为赞赏,连声说:“好!好!这个同学好!”可惜时隔久远,已记不起到底是哪位同学给出如此既有家国情怀和政治站位,又不失文学色彩的绝佳回答。

那些年武侠热,我痴迷武术,会经常光顾北门街邮电局门口的报刊亭,除了会翻阅那册32开本薄薄的半月刊《辽宁青年》,更多时候是注目于《武林》《武术健身》《精武》杂志,有时会从有限的生活费中省下零钱买回一本。一批武打电影自然也吸引到我,《自古英雄出少年》《南拳王》《木棉袈裟》等等,其中全国南拳冠军邱建国主演的《南拳王》,故事虽已淡忘,但邱建国虎虎生风的南拳、底盘扎实而刚劲迅猛的上肢动作、壮实的身板和刺刀般锋利的眼神,至今仍然以一幅力量美的画面呈现于眼前。《木棉袈裟》有插曲道:“看刀光剑影,谁说佛门清静,杀他个遍天昏”,除暴安良、豪气满腔,看过电影后挂在嘴边哼唱了好一阵。对,除暴安良,这是那些武侠电影故事的一个基本逻辑。

我还记得,某一个深夜,大会堂在数年之后,把曾经轰动一时的《少林寺》拿来再映。虽然新片上映时我已看过数遍,但当初那种被银幕上一场接一场的武打场面和身怀绝技的十三棍僧之气势完全全地地震撼到,那种“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举起鞭儿轻轻摇,小曲满山飘”和“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她身旁,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的美好意象,那种视觉听觉强烈冲击留下的深切而从未有过的体验,促使我在数年后那个深夜再次走进大会堂。然而我清晰地记得,那一遍的观感是失望的,完全没有了初中时的那个暑假,我顶着烈日骑行二十多里进城观看时的强烈体验。

《少林寺》新上映时,盛况空前、火爆异常,从凌晨播放到深夜,一场接着一场,但仍然场场爆满,一票难求,今天看来实在难以想象。一个拷贝要在大会堂和温岭电影院两处播放,因而

还不停地“跑片”。记得有一遍,我是凌晨五六点钟坐在大会堂二楼观看的。室外已经有些光亮,大会堂南北两侧十来个大玻璃窗,用高处垂挂下来的大块幕布遮光,木头的楼梯楼板,长条的木凳,距离头顶很近的大吊扇,被一个铁丝防护网倒扣着罩住,使劲地转动,发出呼呼的响声,同时还能听到背后放映室里放映机转动发出的滋滋声,和换片时两台机器切换操作咔嚓啪啪的声音。

温岭大会堂是那些年全县最重要的集会场所,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一根根粗原木拼接而成的屋顶“人”字架,构筑起一个偌大的空间而无需一根柱子支撑,高高地塑在门头上的水泥五角星,给人以高大庄严之感,县两会等重要会议均在此召开。直到上个世纪末,在许多温岭人心中,大会堂算得上是县城的一个文化地标。

我唯一一次到大会堂开会,而不是去看电影的经历,是学校组织去听一个演讲。演讲的内容已毫无印象,却记住了那个身披风衣的演讲者的名字——李杰,只因为此名与武术明星、《少林寺》主演李连杰相差一个字。后来知道,李杰是一位活跃于全国各地、在广大青年中有着不小影响且被舆论聚焦的教育演说家,改革开放初期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应该是他的高光时间,随着时光流逝,后来逐渐沉寂,现已于几年前去世。

淡去、退出、告别,当完成了自然、社会或历史使命,然后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中,这是包括生命在内的万物之宿命。就像那些年看过的每一部电影,即使有过高光闪亮和热烈辉煌时,但最终落幕散场去。

那些年,放映一部电影之前,往往先给播放一个二三十分钟的短片,现在看起来颇有点“买一送一”的意思。短片的内容有专题新闻片、纪录片之类,通过这个环节,我曾看到过某一年我国运动员参加新德里亚运会的纪录片,看到过当年刚刚被发现但尚未开发的九寨沟自然风光介绍。太漂亮了,怎敢想象,有一天能有机会亲身去到那遥远的川西高原,零距离感受大自然的五彩绚丽。当然,到了数字化时代的今天,到了全民直播时代,通过纪录片来传播和介绍体育赛事,早已成了过去式。

有一组日本系列电影,名字叫《寅次郎的故事》,是关于主角寅次郎的一个个生活小故事构成的系列,上学那几年过一段时间会上映一部,过一段时间会再来一部,看得既亲切又感人。寅次郎是一个憨憨的、十分善良、乐于助人的城市平民小人物,其人物形象我脑子里依稀还有,其中有一部讲述的是关于他一段无疾而终的爱情故事,记得电影结束后我还曾为他落寞、

为他惋惜过。

凡人故事、市井烟火,不知不觉中让观众看者融入情感。

路遥小说改编的电影《人生》,演绎高加林、巧珍的人生故事,这大概是那些年让我们这一拨青春年少者,第一次真正走进成年人精神世界的第一部电影。干涸贫瘠的黄土高坡,沟壑深深,向往城市文明、渴望改变命运的梦想,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命运沉浮和不屈的挣扎,看得人心情沉重、压抑。多年后的一次机会,我到了位于宁夏腹地的镇北堡影视基地,参观了重现的《牧马人》《人生》部分场景,瞬间就被带回到了《人生》剧情中,眼前浮现出高加林失望、无奈和不甘的复杂表情,令人心生感慨。

置身时代大潮,个体命运就如沧海一粟,谁主沉浮?

《茶馆》是在一个北风乍起的冬夜看的。电影结尾,昏黄的灯光下,风烛残年的王掌柜缓缓地抬手,一把把向空中抛撒纸钱,发出绝望的喊声,步履蹒跚向屋内走去,任纸钱随寒风乱舞。这阴冷的一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影毕,夜深,从继光路的大会堂正门出来,往虎山脚下走去,人民西路清冷的街道杳无人影,街路两侧门壁森严,昏暗的街灯透过晃动的悬挂物照过来,忽明忽暗,我们的身影也在地面上忽长忽短地摇晃变幻。经年累月被人们用双脚磨得发光的石板路面,幽幽地泛着青光,令人有些毛骨悚然。经过县前街与人民西路交汇的丁字路口,那个用来张贴新闻和海报的牌坊,高高地竖立在暗淡的光影里,粘帖其上的那张印有《茶馆》剧照的大幅海报一角已经剥落,旁边还有一张白底黑字,其上勾划着血红色对号的死刑犯判决书,寒风袭来,一阵寒颤,翘起的海报在寒风中颤动着,拍打着,让人久久地沉浸在电影剧情和着寒夜而来的阴森沉重之中。

数十年后,能够依然清晰地感知体味当年那一幕的阴冷、萧瑟和沉重,我想,这大概就是名著、经典的魅力所在和非凡之处。

物换星移几度秋,沉思往事立残阳。三四十年来,城市在经济起飞、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中不断扩展更新和蝶变,现如今,偏居一隅、完成了历史使命的大会堂早已不再放映,孤寂落寞替代了昔日的人头攒动,低矮屋顶破旧院落畏缩在四周的钢筋水泥下,尽显破败、卑微,完全无法想象记忆中的庄严高大。虎山脚下的校园已经名花易主,断头换面的上水洞路早已烟火不再,西操场更是无从寻觅,只有大会堂门口那堵依然伫立的厚厚砖墙,以及墙上两个顶端弧形的售票小窗,似乎还在依稀地诉说着,那些年里曾经的拥挤和热闹。

去大会堂看电影

(来自水乡泽国) 跟云

人间遐想

姑妈

应徵徵 (喜欢在山坡上遛狗看云)

算起来,姑妈七十有六了,白发却还没几根,皱纹也没多少,白净的脸庞,自然卷曲的头发,年轻时那美丽端庄的模样还依稀可见。

姑妈自小聪慧,不幸却患有小儿麻痹症,走路时左脚微跛。正因如此,她失去了留省城接母亲煤矿厂班的机会,在村里嫁了老实淳朴的姐夫,养大了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张罗孩子成家生子,平时帮着带带孙子孙女,一过,就是五十多年。

尽管姑妈生活在农村一辈子,她身上却看不见某些农村妇女的那种庸俗、跋扈和狭隘。也从不见她无事时坐到村头,和其他妇女数落村里的家长里短,搬弄是非的画面。可能是有一个当老师的父亲,耳濡目染,她说话总是轻声细语,从不会和人争什么。她知礼节,明事理,待人接物得体大方。年轻时,边跟着姑父下地干些农活,边在家帮人缝制衣服,赚取家用。与生俱来的心灵手巧,让她的缝纫技术在无人指点的情况下胜人一筹,再加上她为人和善,做事用心,村里人都愿意把新衣服交给她缝制。平日里,姑父再揽些泥瓦匠的活,小日子过得也还算幸福美满。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时代的变迁,姑妈不再下地干活,也不再缝制衣服,就在家打理家务,做做饭,偶尔照看子孙儿。

在没搬到儿子的新房子前,几十年来,姑妈家住的都是老房子,两间简陋的二层平房,房前一个窄小的天井。每次去姑妈家,感受到的都是浓浓温情。她的家里虽贫寒,却从来都是一尘不染,各种家什收拾得井井有条。通往二楼的露天台阶上,依次摆放着一盆盆长势良好的兰花,叶儿修长碧绿,花儿芬芳馥郁,阳光斜洒下来,静谧又温暖,那都是姑妈精心照顾的成果。厨房狭小却永远飘着香味,升腾着热乎乎的烟火气息。

姑妈烧得一手好菜,尤其是那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小吃,如麦饼、泡糍、饼筒等。经她的手,普通的食材都好像有了灵性,让人食欲大增。

“先坐会儿,你爸爸身体怎样?小囡囡又长高了,来,先吃个橘子……”每次去姑妈家,一进门,迎接我们的不是高亢亢亢亢的声调,而是温软细语的家常,仿佛是日夜相处的自然默契,一切都恰到好处。

“我知道你们喜欢吃麦饼,那午饭咱们就做麦饼吧!”她和我们边拉着家常,边拖动不灵便的脚,灵活地在厨房忙碌开了。快速地揉面、醒面,又利索地从腌缸里捞出腌菜,洗毕,三下五除二,切成细碎状备用。接着,又麻利地从冰箱里拿出一块肉,切成细块,便在案板上“笃笃笃”地剁开了。不一会儿,香气四溢的馅儿拌好了。我坐到灶膛后,帮忙生火添柴的工夫,姑妈已迅速地擀好了一个麦饼,轻薄、均匀,等着下锅。

待锅热,下油冒烟后,姑妈一只手小心地提起麦饼的一端,另一只手快速地一托,这粘手又易变形的麦饼居然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平整地躺在了油锅里。在热油的滋滋声中,麦饼开始变得金黄,令人垂涎的香气也开始四溢。姑妈趁手娴熟地转动着,让麦饼的每个角落都均匀受油煎,随即,又飞速地翻转到另一面,动作一步到位,一气呵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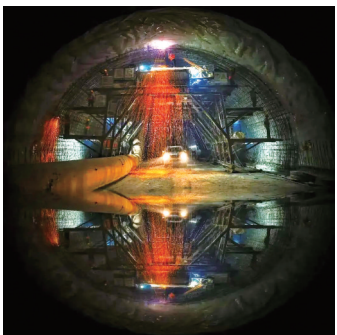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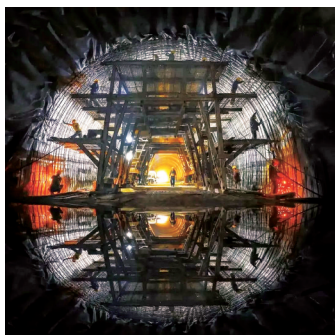
喷香的麦饼被切成了三角状,上桌了。夹起一块,张口一咬,松脆可口、皮薄馅匀,入口的滋味真是妙不可言。姑妈在一旁微笑着,静静地看着我们大快朵颐,慈爱溢满眉梢。屋外,天井台阶上的几盆兰花也正悄悄绽放,幽香飘至,叫人神怡。

决战隧道

赵国忠 摄

这组作品,摄于228国道泽国至玉环大麦屿(疏港公路)改建工程,104国道大溪塘岭至吕岙改建工程,以及甬台温高速至沿海高速温岭联络线。隧道施工作业人员都是专业的特殊工种,他们凭借精湛的技术,吃苦耐劳的精神,挖通了一座座优质的隧道。同时,我们也借此难能可贵的画面,起到隧道施工警示——关爱生命,关注安全。

(台州市摄影家协会供稿)



故人故事

算来小学毕业足足20个年头了,前阵子,一小同学说起,许久未见小学班主任胡惠芬老师,想着一起来探望一下,后听闻老师新冠阳康后身体还未调理好,讲话声音很轻,不方便见学生。

胡老师其人

胡老师一米七的个子,炯炯有神的双眼,对学生严管厚爱,对事业追求极致,纯粹的基层教育工作者,生活非常朴实。本是知识青年下乡,婚姻、事业都在黄礁,扎根黄礁中心小学几十年直到退休。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乡下中年教师,普通话多多少少带点口音,胡老师的普通话却极为标准,据说是为了语文教学需要推倒重学的,这只是她事业追求极致的一个缩影。胡老师对于书写的要求极高,她的授课板书和作业批注都像印刷上去的,农村学子从小能在字正腔圆的环境成长,是颇为幸运的一件事。

胡老师从低年级教写字开始就要求学生工整书写,也用她独特的方式给我们灌输“字如其人”的人生哲学。她不支持学生使用自动铅笔写字,因为传统铅笔写出来的字比较有力量感;她也不喜欢学生用自动卷笔刀,一来为了锻炼学生削铅笔的动手能力,二来避免学生把注意力浪费在摆弄文具上,抑或是在铅笔达不到自动卷笔刀工作长度时,就随手扔掉,从而减少攀比和浪费。

她是出了名的严格,以至于很多人

没注意到,胡老师是个多才多艺的老师。她精于音律,教学生涯早期还兼教过音乐,虽然常年受咽喉炎影响,唱歌只能唱一小段,但是每当她弹起风琴响起歌,那悠扬的歌声琴声,便是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当然,也和很多班主任一样,她也时常把音乐课变成语文课,那木质风琴也随时光缓缓老去,像音乐课一样摆放在教室的一边。

漫漫园丁路

记得小学时,胡老师总是在周六上午、寒暑假初期,把全班同学叫到她家做作业。胡老师夫妻俩都是教师,两间房子收拾得一尘不染,大大小小的桌凳,甚至连手拉车扶手、楼梯台阶都填满学生。同学们做完作业,给老师批改订正完就能“放生”玩耍了。

这样的“集体小灶”一开就是数年,她从来收取任何费用,却经常留邻村路远的学生在家吃饭。她的家俨然成了我们的第二课堂,在胡老师的教育下,同学们对待学业、作业普遍比较认真,对于需要背诵的课文、诗词,也从不打折扣。

上世纪九十年代,农村学校的教学设备很简陋,仅有的教学投影仪灯机,老师们也舍不得长时间用。胡老师准备的投影课件可谓一绝,她绘制的透明幻灯片,图文并茂、色彩斑斓,投在白色幕布上,是无数个日夜伏案的打磨和呈现,精心浇灌进学生的求知心田。

在那个注重成绩的年代,胡老师也不放松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班

级里的文艺积极分子几乎都是校队主力,唱歌、朗诵、小品、三句半,从选材、组队、排练到演出,她全程亲力亲为,对于不够到位的细节,往往能练上十遍,甚至几十遍。

难得师生缘

我比同龄人早一年入学,记得一年级第一课选班干部时,胡老师说哪位同学坐得最端正就给谁当班干部。我清楚地记得坐在前排的自己绷紧全身,随着老师目光的检视而忐忑不安,更想不到老师直接点我当班干部,而后几年悉心培养。

当班干部的要求自然比其他同学更高,胡老师对我书写的严厉程度一度达到了“苛刻”的程度。记得有一回在老师家潦草交作业,胡老师眉头一皱要求重写,我悻悻地羡慕那些得以顺利过关的同学,不情愿地重抄了一遍交给老师,老师看了眉头又一皱:“还是太潦草了,重写。”

就这样退回重写六七遍,留下来的学生越来越少,等到只剩我一人的时候,终于勉强过关。那天的阳光比较刺眼,走出老师家,眼眶里的泪水再也收不住了,我不明白为什么老师对我这么严格,一路大哭回家,说什么都不愿再读书了。

后来父母带着我来到胡老师家,跟老师说后,胡老师安慰道:“是不是对你太严格了?”我点点头。“那老师以后对你要求不那么高了好不好?”从这之后,我对写字丝毫不敢怠慢,她对我

的关心也依然不减。初高中去临海读书后,我很少回去看老师,胡老师多半是在和我母亲碰面闲聊中,得知我的学习和工作情况。

偶遇胡老师

兔年正月下旬,我陪同母亲去台州中医院打针改善睡眠,正和医生交流时,针灸室出来一位包裹严实的人,上来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母亲,轻声叫出我名字。我和母亲迟疑良久,完全没想到会偶遇胡老师,直到她摘下围巾,我才认出这位曾经对我高标准严要求的恩师。

退休十余年,胡老师除了头发花白不少,容貌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看起来也是红光满面。胡老师无奈道出自己体弱怕冷,胃口也不好。本想带妻子给老师上门诊疗一下,胡老师连忙拒绝,也不透露现在住在哪个小区,说自己学生从事中医的也有很多,但不想我们看到她现在的样子。

她总是很操心,却不愿麻烦别人一分。胡老师不停地向医生介绍我这个学生,对我的成长往事如数家珍,却坚决不同意我送她回家,说等自己身体调养好后,再主动见同学们,随后坐上门口候的何老师车后,伴着暖风缓缓归去。

都说好的老师能够影响孩子的一生。每当他人问起我是否学习过书法,我回答“没有”之后,总会提起当年胡老师对我的严厉要求,有那个平凡而伟大的启蒙老师,以身作则、善待他人,把全部心血倾注在自己热爱的事业上。

胡老师

(正月十四出生,自称拾肆先生) 金红雨